

2018年11月23日,由芳草杂志社主办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芳草》自2018年第5期开设“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专栏,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探讨如何以文学方式来书写、参与“精准扶贫”时代课题。

中国乡村及贫困书写谱系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认为,中国乡村叙事有五个阶段:启蒙叙事、田园叙事、阶级叙事、家族叙事和地方志叙事。其中地方志叙事,像刘醒龙《圣天门口》、贾平凹《秦腔》、毕飞宇《平原》、阿来《空山》等作品,都是把村庄作为聚焦点和表现对象,以类似地方志的方式进行乡村书写,这种书写实质是一种本土化的叙事方式,作家凭此来对抗文化的全球化。

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马步升从作家的主体意识谈起,他表示,20世纪的中国作家无不承担起作家在时代面前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关于乡村书写的文学使命,其共同特点为:书写对象身份明确,以启蒙为主要价值追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等,将他们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即得整个世纪中国乡村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遇春独辟蹊径,分析百年中国乡村文本人物谱系,认为有三种语境下的农民形象演变:启蒙语境、革命语境再到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形象,其文本书写基本是批判性、建构性同步进行。他表示,当前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是一个有待开掘的文学矿藏,但艺术之门依旧紧闭;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谁要是能够塑造出站得住脚的这种新型农民形象,我觉得他很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代言人。”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鲁平畅谈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对农民摆脱贫困的书写集中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如刘凤伟中篇小说《山地》;进入90年代,农村改革步入艰难,农民将梦想寄托于乡镇企业、工业,于是出现了书写农村复杂矛盾和农民焦虑的代表性佳作《分享艰难》等;在21世纪精准扶贫大背景下,农民已实现大规模向城市迁徙,书写贫困的乡村文本自然演变成书写农民城市生存的文本。

河北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彬梳理新时期乡村文本,发现两个新趋势:一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探索让位于对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以现代意识来反思农民生活,其中包括反思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及反思乡村政治生态。同时,他直言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学书写对“精准扶贫”的反映普遍较浅显。

当下乡村生活观照与书写者的坐标重建

书写者到底以何种心态去看待、书写乡村?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贺仲明认为,当前作家的姿态存在问题。他分析,作家必须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才能进入好的创作状态,作为国家战略的精准扶贫,有可能为乡土写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关键就在于作家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心怀谦卑”地深入生活,写出真实的乡村现实,从而让大家更准确地了解乡村、扶持乡村,这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文化扶贫。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蔡家园认为,面对时代新变,作家必须走出书斋,虔诚进入生活现场,不仅身入更要心入,要采取平视甚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蚯蚓视角”,更加谦卑地审视生活、乡村和农民。他还提供两种深入生活方式供作家们参考:柳青的定点式和路遥的漫游式。

只有实现了文化的扶贫,精准扶贫才能达到一种长远效果,实现脱贫根本性改变。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以延安时期著名秧歌剧《夫妻识字》为例,提出了具有根本性的翻身理念:“学文化”、“子孙孙不受害”,刘醒龙中篇小说《凤凰琴》,则是在礼赞当代中国教育的脊梁、乡村文化守夜人——中国乡村民办教师。

“农民的贫穷感、边缘感,乡村被抛弃的荒漠感,实际上是在与文明、城市对流以后才产生的,这种感觉才是真正的被遗忘或者说被忽略乃至被抛弃感”,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春桐对乡村贫穷有着独到理解。他认为,贾平凹、刘醒龙等作家已意识到这种来自农村的“绝望感”,它绝不是生存层面的贫穷,而是生活层面尤其是精神生活层面的贫穷感。

上海交通大学何言宏教授立足文化作进一步展开:人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甚至女性学者特别关心的性别问题,都会在贫困的生存处境之下发生很大变异,相关艺术表达不只涉及常见的小说,还涉及诗歌、影视影像等,比如诗人峭兵笔下的渔民,对贫困的书写就很充分。“实际上通过对贫困的书写、关注,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不只在(上海)陆家嘴,还在更广大的乡村。”

在城乡视角下观照农村成为乡土作家的一个新趋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表示,能否立体、全方位地观照时代热点,是对作家写作能力、思维方式的考验,而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向城镇化的转化,农村的消亡已不可避免,故而他认为作家必须要有超越的眼光,但不等于远离时代,而是要求作家改变思维,去拥抱变化的时代。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历史性书写

关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文艺报》文学评论部主任刘颖直言,她更想看到今日乡村的生长性。刘颖谈道:当下相关文本书写的视角都是自上而下,而乡村的生长性须自内而外;目前无论是想象性文本还是挽歌性文本,呈现的乡村生长性都较欠缺。“这种自内而外的生长性,无论是精神生长还是文化生长、道德生长,从各个方面都看不到特别的让人感到有希望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也是我的一种期待。”

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汤天勇痛揭“病灶”:为何相关乡村文本佳作难觅?一是很多作家仅仅是为了“精准扶贫”政策性的图解和言说;二是作家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解过于狭隘,影响其有效表达;三是作家对农村、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的匮乏;四是许多致力于乡村写作的优秀作家对此新领域尚持观望态度。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新民提出,谈论乡村贫困,须有十分明确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写贫困所秉持的立场并不相同。他强调,精准扶贫视野下的贫困书写须注意历史向度与历史内涵,当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贫困书写须有历史着眼点;而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历史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决定了此背景下贫困书写须超越简单的道德诉求、情感宣泄。他断言,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全民脱贫的历史道路角度去书写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贫困,乃历史性最新要求。

《文学评论》编审刘艳认为应大力提倡贴近乡村叙述,以内置乡村视点写出乡村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续和拥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呈现“新乡土中国”整体性审美书写维度的文学书写。她例举贵州作家欧阳黔森2018年发表并引起反响的精准扶贫报告文学三部曲,强调“突出了本地特色,才会产生拥有本地特色和地域性特征的精准扶贫题材的乡村生活文本,才能避免千篇一律作品的产生。”

如何用小说来处理精准扶贫话题,或者来表现当下的乡村生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例举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认为它跳出了“50后”、“60后”作家从政治、权力或者老式乡村角度来写乡村的藩篱,而是别开生面自中青年女性这一身份角度去写乡村现实。那么如何处理当下乡村生活呢?他例举莫言短篇小说《地主的眼》,其中爱慕虚荣的老地主“打肿脸充胖子”,被划成地主,成为专政对象……但最后其孙子回到当地的农村,热爱土地,且用机械化来耕种。读此篇会看到,“年轻一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逃亡,也还是有人重新回到土地上搞发展,搞建设,搞生产”。

蔡家园建言,新的乡村文本能否实现突破,关键在两点:一是作家能否塑造出新人物、新的农民形象;二是能否建构乡村书写新美学。

传统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是优雅化了的一部分,精致化了的一部分,精神化了的一部分,诗化了的一部分。它改变了生活节奏,丰富了生活,美化了生活,提升了生活。

爱国首先要爱文化 爱文化从传统节日开始

郭文斌



节俗和仪式中得以熏染和传承。

中国文化讲究教化成俗,文化只有约定成俗,成为风尚,成为具有仪式感的国民行为习惯,才能传之久远。而传统节日正是文化的俗成部分,习成、仪成部分。锦绣中华一旦锦没有了,绣将无处着附。正如土壤没有了,再好的种子也将无用。关于这一点,我在长篇小说《农历》的创作谈《想写一部吉祥之书》里,通过经典教育和民间教育的关系,展开讲过。

今年,由拙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农历》将由北京谷天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牵头摄制,相信小说的荧屏化,会让人类通过中华传统节日的特有视角和不可替代性价值思考重建心灵故乡的意义。

三

近些年来,国家对传统节日日益重视,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首先能给人以安全感、归属感、家园感。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我看来,安全感是基础,没有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就无从谈起。

传统节日为什么能够给人提供安全感,一则,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基因般的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就像大海之于浪花,浪花离开大海,就会蒸发,个体意识离开集体意识,就会恐惧。

而人一旦恐惧,第一,就要向外界在世界抓东西以填充内心的恐惧感,占有欲、控制欲和表现欲就随之到来,一旦满足不了,人就会抱怨、生气,之于个人,则会伤害身心健康,之于社会,就会造成动荡和灾难;第二,内心就会焦虑,就会抑郁,现在13%的焦虑比率,背后隐藏着十分可怕的心理危机,许多人自杀都与此有关。

传统节日之所以能给我们安全感,和古人对它的设计有关。

古人按宇宙节律、生命节律设计节日,节日就像竹子的节,正好是时令和生命的关键处,让人们在紧张的劳作中休息一下,休整一下,给生命充电,任何电器功能再好,如果电没了,一切功能都无用。就是说,传统节日,是古人按照宇宙和生命节律做出的科学设计。

大多传统节日都和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有关,初一和十五居多,而初一和十五正好是阴阳二气的交汇处,让人们以过节的方式休息、休整、充电,让细胞在放松中更新和休整,让因过度劳累而损伤的生命在安静中得以修复。

大多传统节日,都有连根养根的功能。祭祀天地是人和宇宙、大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祭祀祖先是人们和祖先进行能量交换。现代心理学证明,人的潜意识是永恒存在的,既然人的潜意识永恒存在,那么祖先的潜意识也应该在,既然祖先的潜意识还在,祭祀就不但是一种仪式,而具有能量交换的意义。

我们知道,没有根的茶会死掉,没有源的水会枯竭。在传统节日中,一族人往往要在祠堂聚会,集体阅读家谱,集体温习家训,集体教育孩子,“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小孩在这种氛围中长大,就会洁身自好,不敢作奸犯科。

现在,人们教育孩子,往往从效率着眼,却很少有人从安全感着眼;往往从成功着眼,却很少有人从不败着眼。而古人对传统节日的设计,就用心良苦,正是要让后代既有效率感,又有安全感,既成功,又不败。

从幸福感的角度讲,传统节日往往注意礼节性的人情往来,叔伯姑娘要走



爱国首先要爱文化 爱文化从传统节日开始

现在很多“洋节”大行其道,很多年轻人对外来节日的了解甚至多过本土的传统节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西方的文化输出战略、我们自己的文化态度、经济态度和教育态度四个方面。偶像文化推波助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西方式教育一家独大,这些都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洋节获得了合法性、合理性,自然就乘势而入,并大行其道。

特别是留学风,多少孩子成长在外国,学习在外国,当然也就“节日”在外国,回来之后,西方节日就成为他们的情感寄托。

“留学”首先要“留学”,把自己的文化先留住,再留学。换句话说,留学应该是在扎下本土文化根之后,在形成自己的认知方式、价值观、行为模式、学术范式之后,换句话说,先认亲爹,再认干爹,先吃娘奶,再吃洋奶,这样孩子的生命系统就会健康,免疫系统、修复系统就会健康。如果孩子本土的感受力、判断力、行动力、持久力、反省力没有形成,两套认知方式、价值观、行为模式、学术范式就会在孩子内心形成混乱,互相干扰。

当然,这就要求主导教育的人先弄明白,何为源,何为流,何为本,何为末。既然我们降生到中国,我们的基因就是“中国”。就像庄稼长在地里,鱼生活在水里,一个是土性,一个是水性。这种生命基因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标识、命脉、精髓。

在这里,我们要处理好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原则是,一定要把根留住,把源头护住。小麦一定要落土,水稻一定要入水,鸟儿一定要升空,鱼儿一定要归流。我们的祖先引进佛教文化,前提是有助于巩固孝悌文化,结果,佛教文化和孝悌教育文化双赢。当儒家文化发展到心学,儒释道三家已经不可分。但中国文化的道统之根没有变,天人合一的学统之源没有变,孝悌文化的根脉没有变。这是一种吸和收的关系,而非变和换的关系。

《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洋节以压倒性之势进入的局面,就得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态度。

党和国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着手解决。十几年前,中宣部就启动了“我们的节日”工程。6年前,央视以破冰之势拍了八集《中国年俗》。5年前,开拍540集体量的史诗性纪录片《记住乡愁》,目前已经播出260集,百姓拍手称庆。

二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在我看来,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之一,就是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之一。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是优雅化了的一部分,精致化了的一部分,精神化了的一部分,诗化了的一部分。它改变了生活节奏,丰富了生活,美化了生活,提升了生活。

《农历》2010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60位评委投票,最后一轮得票第七,有人说,《农历》是“中国符号”。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农历》首版8年来,每年一次重印,说明这个选题是对的。我常说,《农历》的写作,就是一个作家的爱国主义行动,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文化,要说爱国,是需要考量一番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说明读者越来越重视传统节日。前年由中央电视台总编室根据《农历》改编的动漫《六月说过年》,在央视重大宣传平台“一号线上”推出后,一时成为新闻热点,第二年重播,现在已经被不少幼儿园和中小学作为视频教材。

而我和国际中文频道联手,也是《农历》的缘分。由此,我以文字统筹的身份从八集大型纪录片《中国年俗》开始合作。因为播出反响强烈,第二年启动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我又被制片人邀请担任文字统筹。不想首两季播出空前成功,节目也被扩至540集。目前,节目已播出260集,观众达到近100亿人次,被誉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接地气的精品力作,已经摘得近10项全国性大奖,包括中国电视最高奖项“星光奖”。

《记住乡愁》中,相当内容就是传统节日,不少节目都是以传统节日作骨架的,特别是少数民族部分,传统节日不但是其精神载体,还是其文化符号,尤其是其识别符号。

推而广之,正好可见中华传统节日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and 角色。传统节日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载体系统,也是符号系统,更是识别系统。打个比方,如果传统文化是承载智慧的书本,那么传统节日就是承载智慧的课堂。课堂没有了,书本也就束之高阁了。《农历》中,五月和六月虽然没有接受专业教育的条件,但是有仪式性传统节日在,教育的核心部分就在习如风的风

